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二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	李大钊(1)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1920年11月—1921年2月)	陈独秀等(5)
〔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	胡适(10)
三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	胡适(12)
四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	胡适(16)
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	胡适(19)
我的自述(1922年6月16日)	胡适(24)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920年12月1日)	陈独秀辑(27)
社会主义批评(1921年7月1日)	陈独秀(42)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年4月8日)	李达(51)
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1922年2月13日)	旋(61)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1922年7月1日)	新凯(64)
〔附〕一个申说(1921年2月15日)	张东荪(72)
现在与将来(1920年12月15日)	张东荪(75)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1月19日)	梁启超(83)
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1922年4月10日)	张东荪(90)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	蔡和森(92)
共产党的根本主义(1921年5月7日)	《共产党》短言(96)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1921年6月7日)	《共产党》短言(97)
陈独秀与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信(1921年8月)	(98)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1921年1月28日)	无懈(119)
夺取政权(1921年5月11日)	无懈(124)
〔附〕师复言论摘录(1913—1914年)	(128)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1919年5月)	黄凌霜(143)
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7月)	凌霜、独秀(146)

北洋军阀对进步刊物的摧残	阴法鲁 (147)
〔附〕段祺瑞关于日本田中少将在苏联宣布废除帝俄	
侵略密约制造谬论策动破坏的报告及反苏命令(1919年9月12日)	(150)
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关于压制	
旅苏华侨归国和防范苏联革命影响的文电(1920年5、6月)	(151)
美国和北洋政府勾结查禁革命报刊的有关文电(1920—1921年)	(152)
国务院关于拟订惩治“过激党人”	
专条案致内务部公函(1920年12月29日)	(154)
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建议修订	
反共专条法律扼杀革命呈稿(1922年)	(155)
吴佩孚仇视苏联帮助外蒙发展工业并进言检查	
在华苏联代表越飞来往函件电致王怀庆函(1922年11月3日)	(156)
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等给大总统的报告(1922年11月)	(157)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159)
《共产党》介绍	(162)
《共产党》短言(1920年11月7日)	(169)
《劳动界》介绍	(170)
《劳动界》发刊词(1920年8月15日)	(176)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1920年10月10日)	(177)
《劳动者》介绍	(179)
《劳动者》发刊词(1920年10月3日)	(182)
《劳动音》介绍	(184)
《劳动音》发刊词(1920年11月7日)	(187)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1920年11月21日)	张国焘 (189)
〔附〕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	文 今 (19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
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	(197)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	(200)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	(202)
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潭秋 (203)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 达 (207)
〔附〕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 (213)
我与共产党	陈公博 (223)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葛萨廖夫 (254)
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	何长工 (260)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 (270)
《劳动周刊》介绍	(275)
〔附〕上海劳动组合创办劳动周刊(1921年7月)	(279)
《先驱》介绍	(280)
《新时代》介绍	(292)
《向导》发刊词(1922年9月)	(297)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9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1921年7月7日)	(307)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几个有关文件(1922年4—5月)	(308)
劳动立法运动的几个有关文件(1922年8月)	(311)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盛况(1922年2月5日)	须 除 (314)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1922年4月9日)	(315)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致汉冶萍总工会 成立大会的祝词(1922年12月10日)	(316)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1922年9月14日)	(317)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罢工宣言(1922年12月5日)	(319)
香港海员大罢工	邓中夏 (321)
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至 愚 (333)
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资料选辑	(34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0日)	刘少奇 朱少连 (37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1923年2月7日)	(388)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 工人阶级与国民(1923年2月27日)	(390)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27日)	(391)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1923年12月22日)	邓中夏 (397)
中国共产主义者宣言	(400)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	(403)
一九二二年前后国内政治形势大事记	(410)
新四国银行团和华盛顿会议	胡 绳 (415)
〔附〕关于华盛顿会议的一些资料	(419)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	蔡和森 (425)
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1923年1月)	蔡和森 (428)
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	春 木 (431)

〔附〕孙中山一九二一年对外宣言	(432)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宣言	(433)
孙中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和平统一宣言	(435)
上海各团体发表废督裁兵宣言(1922年7月)	(436)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	蔡和森(438)
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1923年5月7日)	瞿秋白(442)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1922年9月)	陈独秀(452)
〔附〕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1920年11月9日)	章炳麟(455)
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3日)	蔡元培、胡适等(456)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1920年)	(459)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464)
〔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缪楚黄(465)
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1922年)	萨发洛夫(468)
东方问题之题要(1922年)	(478)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	(48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7月)	(494)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494)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 C·P·C”的决议案	(494)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495)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497)
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	(499)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501)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504)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505)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506)
中国共产党章程	(508)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	(511)
〔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马 林(512)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	(51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52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1923年6月)	(522)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52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1923年7月)	(526)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526)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529)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530)
劳动运动议决案	(531)
农民问题议决案	(532)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议决案	(532)
青年运动议决案	(532)
妇女运动议决案	(5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53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1923年 7 月)	(535)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1923年8月1日)	(538)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 4 月25日)	陈独秀 (541)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 1 日)	陈独秀 (545)
〔附〕 卑之无甚高论(1921年 7 月 1 日)	陈独秀 (552)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 1 月26日)	(553)
〔附〕 越飞和孙中山谈判的简单经过	(554)
苏联政府外交部门负责人	
与孙中山的往返信件(1918年—1924年)	(555)
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 (562)
〔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黎 澍 (566)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相互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迹，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 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 派与 Fourier 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yes 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 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 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 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 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然。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

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来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说，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王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

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时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 寄自昌黎五峰

（原载《每周评论》35号，1919年8月17日出版）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①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九二一年二月)

陈 独 秀 等

一、陈 独 秀 的 信

适之，一涵兄：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②，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 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二、胡 适 的 信

仲甫：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于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

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函、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分。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三、胡适的信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陈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分，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 移回北京，2.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意，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绝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想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

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月二十二日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在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之。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趋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四、鲁迅的信

适之先生：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办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妥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树（1921）1月3日。

五、李大钊的信

适之兄：信已传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象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才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守常。

六、陈独秀的信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③，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④，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 独秀 白 二月十五日

① 原件存北京大学。

阴法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本相：“……他（胡适）说：1919年6月中，“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七月间，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争论，就是他进行这种阴谋的表现。艾思奇说：“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与富于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李大钊同志与胡适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在这个争论中，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1951年史学周刊第十七期）

②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有“本志特别启事云”：“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以后凡直接在本社总发行所定购一卷以上者，在此期限内发行的特别号（例如前次的劳动节特别号）概不加报价及邮费。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

③ 按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梓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包探到印刷厂抓去，以致不能按期出版，直延至1921年4月1日才出刊。第九卷第一号“编辑室杂记”里，曾有下列的声明“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劳爱读诸君，屡次来信询问原由：本社非常抱歉——这也许是中国应该向我们抱歉！”

④ 按：信里所提的“你们另办一个报”，就是一九二二年胡适等所主办的努力周报，和流产的“努力半月刊”或“努力月刊”。（胡适的停刊信里说：努力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

但亦不放弃政治。俟改组就绪，再行出版。)

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一九三三年南强版)有一篇最小的问题与最大的发现记录胡适回答读者的一封信，揭露了胡适的真实面目。原文云：“……在努力周报停刊的时候，胡适他们有努力月刊的筹备，可是很久仍不见这刊物的出版。后来有一个读者，便在1924年8月20日的晨报附张上提出关于这刊物的质疑，并要求胡适本人的答复。……可是胡适当时并没有答复，代替他出场的，却是努力的主将之一的高一涵。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的报上，发表了这样一封答复的信：“努力是胡适之先生独办的报，当然只有胡适之个人决定他的生死；我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就是发表意见也不能代表努力社的主张，可是适之先生现在北戴河养病，……所以做小卒的我，便不得不越分回答几句话。努力月刊的倡议在去年秋天，商务印书馆一听到这个消息，便要求归该书馆承办(或包办)，同时亚东图书馆也想代为发行，两家竞争的结果，总让商务印书馆战胜。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适之先生想得一点稿费来报酬长期投稿的穷朋友，本是办报人应该有的善意；但是教我想出来为三块钱至五块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争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这个小卒对于商务印书馆要包办的努力月刊，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1924年9月，就在高一涵短文发表的次一个月，在12日的报上，胡适是自己出马，来答复了一篇文章——如其说是答复读者的质问，还不如说是反对高一涵的答复，向商务印书馆赔罪来得确切。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努力的问题，它的内容是：

“……我个人的主张，是努力应该继续出版。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独秀文存卷一)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这种现象使我们感觉努力真有必要急急出版的必要。……至于一涵先生代我作答，我自然是很感谢的。但他提及商务印书馆的一层，未免有点失实。商务印书馆对于努力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对待脑筋苦力的关系，办杂志也不是挣红利的好法子。……努力社有几社员现在商务编辑所，这是第一层关系，商务管理部有几位老辈，对于我个人的友谊，是第二层的关系。当努力周报出版以后，张菊生、李拔可诸先生皆曾表示赞成我们的主张。后来商务发行部自己提议，破例为我们代售努力，并代理定阅。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自动的破例经理这三个铜子的生意，这是谋挣红利吗？周报停办后，我们感于无钱办报的困难，所以主张先筹点资本，然后办月刊；或仿从前新青年的办法，由一家书店发行，但发行人须出一点编辑费，以供聘用助手及酬报外来投稿之用。那时商务与亚东都愿任此事，但我和独秀知道亚东的困难，故劝他们让与商务，商务代发行的杂志，本有‘二千以外的销数，每分抽版税三成’的规定；广告费也有二成的税。我们因周报曾销过八千，故以六千分为底子，计算版税与广告税，作为月刊的编辑费。但投稿人愿酬与否，全由各人的自由。这其间有什么‘资本家之威’可言。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其事有可取者，还应该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一段不是对一涵说的，因为一涵并不至于颂扬拳匪。)……”

关于努力周报的主张，中国青年第九十五期(1925年9月)读报杂感有引胡适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二期上发表的一篇国际与中国，对于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有下列的见解可作参考：

一、直奉战争时，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美国愿意废督裁兵，若说美国与日本企图共同利用曹锟、交通系，更是笑话。

二、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美国确实援助中国，彼时许多美国学者、舆论家并不替资本帝国主义者做走狗。

三、新银行团消极组织某一国单独借款，比贪图高利借款给政府的国内资产阶级好得多。

四、外国投资者希望投资所在安宁和统一，民国元年捧袁世凯就是为此，并非恶意，他们希望中国的和平统一，不下于中国人民。

五、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人民之自觉，在巴黎、华盛顿两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是自觉了，中国目前并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

〔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九一九年七月）

胡 适

本报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

“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作一种教训吗？”什么的教训呢？这个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来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

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痛恨“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是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功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些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